

“翻译腔”与任务复杂度和工作记忆关系的实证研究*

王福祥, 徐庆利

(曲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曲阜 273165, 山东)

提要: 本研究考察英语专业学生英汉译文中“翻译腔”现象与翻译任务复杂度和工作记忆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翻译任务复杂度与“翻译腔”的出现频率正相关, 与翻译任务复述能力负相关; “翻译腔”的产生与译者的工作记忆能力有关, 也与译者理解能否生成非语言的、图示性的语义表征有关。

关键词: 翻译腔, 翻译任务复杂度, 工作记忆, 理解, 相关关系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忠实、通顺的译文是每一位译者的追求和目标, 但现实情况是不少译文与此目标相去甚远, 存在着许多洋化和不合乎语言习惯的表达方式, 这就是“翻译腔”。“翻译腔”一直是翻译界和语言学界关注的重点。国内外“翻译腔”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将译文置入目的语语言规范中, 那些游离于目的语规范之外的语言特征就是“翻译腔”; 主要分析手段是标记译文与原文在词法、句法、表达方式方面的对等程度, 并据此判断“翻译腔”的形成原因(Eugene A. Nida & Charles R. Taber, 1969: 13; Alan Duff, 1981: 113; 范仲英, 1994: 98; Frederick Tsai, 1995: 242; 刘宓庆, 1999: 245-246; 方梦之, 2003: 26; 孙致礼, 2003: 95; Mark Shuttleworth & Moira Cowie, 2003: 187)。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翻译腔”形成的主要原因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原文语言表达方式的影响和束缚(obvious reliance on features of source language), 使译文不符合译文语言的表达习惯(方梦之, 2003: 26; 刘宓庆, 1999: 245-246; Alan Duff, 1981: 113; Frederick Tsai, 1995: 242; Mark Shuttleworth & Moira Cowie, 2003: 187)。译者应当尽力摆脱原文语言表达方式的影响和束缚为读者呈现忠实、通顺的译文。可是为什么译者常常难以摆脱“翻译腔”的纠缠呢? 回答这一问题, 我们有必要将目光投向译者的认知心理能力及其认知对象——翻译任务。本文从认知心理视角探讨“翻译腔”与翻译任务复杂度和译者工作记忆能力的关系。

2. 研究方法与设计

2.1 研究问题

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 (1) “翻译腔”与翻译任务复杂度和翻译任务复述能力之间有什么关系? (2) “翻译腔”与译者的工作记忆能力和理解是否相关?

2.2 被试

被试为山东省某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四年级 1 班 25 位学生。所有学生在 2008 春季学期参加了笔者讲授的英汉翻译课。教授过程中, 笔者为每位学生建立了完整的学期翻译练习质量档案, 对每次翻译练习中存在的“翻译腔”现象进行了统计, “翻译腔”出现 1 次计 1 分。以同样的方式对其英汉翻译课程考试情况进行了统计。平时练习得分与考试得分合计得出每位学生总分数。学生得分越高, 译文“翻译腔”越严重; 得分越低, “翻译腔”越轻。根据每位学生的总分对全班学生进行了排名, 然后选出得分最高的 5 名学生和得分最低的 5 名学生。得分低的学生我们称之为 A 组受试, 得分高的学生称之为 B 组受试。为保护受试参与测试

* 本文为山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注意机制探究”(编号 J08WA06)阶段性研究成果。

的积极性, 笔者没有公布各个受试的具体排名, 他们均表示出较强的参加测试的意愿, 希望测试后能够得到更为具体的建议与指导。

2.3 材料

实验测试题包括 18 个英语句子, 全部选自笔者选用的英译汉翻译练习。18 个句子中有简单句 6 个, 复合句 6 个, 复杂复合句 6 个。每个句子的字数都在 20 个单词以上, 最长的 52 个单词。根据 Robinson (2007:296), 语言结构越少, 任务复杂度越低, 反之亦然。任务复杂度与任务本身相关(the task dependent), 是任务的固有特征 (design feature), 它对学习者认知活动的影响与任务本身的认知要求有关, 而不受制于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因此, 从简单句、到复合句再到复杂复合句, 其任务复杂度呈递增趋势。另外, 选取以上句子作为实验测试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笔者假设受试在翻译这些句子时会像笔者教过的上一级学生一样容易产生“翻译腔”。

2.4 实验设计与语料收集

测试任务分模拟测试、正式测试和访谈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为模拟测试, 目的是确定正式测试需要的时间及验证所选测试句子的有效性, 即 B 组受试的译文与 A 组受试译文相比是否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翻译腔”。测试题从选出的 18 个英语句子中选出, 包括简单句 3 个, 复合句 3 个, 复杂复合句 3 个。测试没有时间限制, 但是要求受试不要在翻译过程中花费过多的时间, 所有受试均在 60 分钟内完成了测试。测试结果表明, B 组 5 位同学的汉语译文“翻译腔”比 A 组受试更为明显, 说明笔者上面的假设成立, 所选句子可以用于正式测试。

第二阶段为正式测试。正式测试是在模拟测试 1 周后进行的。测试句子与模拟测试使用过的 9 个句子在句子结构、句子长度及复杂度等方面大体相同, 包括简单句 3 个, 复合句 3 个, 复杂复合句 3 个。正式测试卷印刷方式与模拟测试卷有所不同: 为了有效地观察受试的阅读/翻译方式, 每个句子的每一个意群印刷在一长 20 厘米、宽 6 厘米的纸条上。受试阅读句子就得翻动纸条, 因为即使简单句也至少存在两个意群。正式翻译时, 受试如果前后翻动纸条, 说明他采用了边读边译的方式; 如果不前后翻动纸条, 说明他采用了读后再译的方式。测试期间笔者和其他 9 位助手重点观察受试在翻译时的阅读/翻译方式, 并做了具体统计。为弥补受试翻阅纸条浪费的时间, 正式测试比模拟测试时间延长 10 分钟。所有受试均在 70 分钟内完成了测试。测试结束后 15 分钟内, 笔者及助手立即评阅了受试译文。

第三阶段为访谈阶段。为了保证受试能较好地回忆刚刚结束的翻译过程, 测试结束 15 分钟后访谈立即进行。笔者及助手担任访谈者共同完成了访谈, 并做好了访谈记录。访谈形式为一对一的半开放式访谈, 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复述测试, 受试重读刚刚翻译完的 9 个测试句, 每读完一句, 访谈者要求受试立即进行复述, 以测试其工作记忆能力。第二部分为回忆/再现测试, 要求受试回答在其正式写出译文时是否已经透彻理解原句并建立起关于该句完整的语义概念?

3. 结果

3.1 翻译任务复杂度、复述能力与“翻译腔”间的关系

为了确定翻译任务复杂度、复述能力与“翻译腔”间的关系, 笔者和助手首先统计了 A、B 两组受试复述能力测试结果和译文“翻译腔”出现频率及分布情况。复述能力测试结果采用了李克特(Likert)五度量表, 将受试测试结果分为五个等级并分别给予 5, 4, 3, 2, 1 之配分, 分数愈高则表示复述结果越好。五个等级如下: 能正确复述或能背诵原句的记为“5”分, 稍有发挥但不影响原句意义的标记为“4”分, 稍有差错但是能够复述出句子大体意思的标记为“3”分, 复述结果有较明显错误但仍旧切题的标记为“2”分。不能复述或复述结果完全错误的标记为“1”分。对相应数据做了初步处理后, 使用 SPSS17.0 进行了 Pearson 积矩相关系数二变量相关分析, 具体情况分别见表 1 和表 2。

表1 A组受试翻译任务复杂度、复述能力与“翻译腔”间的相关关系

		翻译任务 复杂度	翻译任务 复述能力	“翻译腔” 出现频率
翻译任务复 杂度	Pearson Correlation	1	-.790**	.620**
	Sig. (2-tailed)		.000	.000
	N	45	45	45
翻译任务复 述能力	Pearson Correlation	-.790**	1	-.425**
	Sig. (2-tailed)	.000		.004
	N	45	45	45
“翻译腔”出 现频率	Pearson Correlation	.620**	-.425**	1
	Sig. (2-tailed)	.000	.004	
	N	45	45	45

**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表1显示，对于A组受试而言，翻译任务复杂度与翻译任务复述能力和“翻译腔”间的相关系数均带有“***”，且显著水平 P 为 $0.000 < 0.01$ ，表明三者在0.01的水平上都具有显著性。翻译任务复杂度与翻译任务复述能力的相关系数为-0.790，说明两者为高相关，二者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翻译任务复杂度与“翻译腔”频率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620，表明二者为切实相关，二者间存在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翻译任务复述能力与“翻译腔”间的相关系数为-0.425，且显著水平 P 为 $0.004 < 0.01$ ，表明二者为切实相关，二者间存在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表2 B组受试翻译任务复杂度、复述能力与“翻译腔”间的关系

		翻译任务 复杂度	翻译任务 复述能力	“翻译腔” 出现频率
翻译任务复 杂度	Pearson Correlation	1	-.814**	.751**
	Sig. (2-tailed)		.000	.000
	N	45	45	45
翻译任务复 述能力	Pearson Correlation	-.814**	1	-.602**
	Sig. (2-tailed)	.000		.000
	N	45	45	45
“翻译腔”出 现频率	Pearson Correlation	.751**	-.602**	1
	Sig. (2-tailed)	.000	.000	
	N	45	45	45

**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表 2 显示，对于 B 组受试而言，翻译任务复杂度、翻译任务复述能力与“翻译腔”三者的相关系数均带有“***”且显著水平 P 均为 $0.000 < 0.01$ ，表明三者在 0.01 的水平上都具有显著性。翻译任务复杂度与翻译任务复述能力的相关系数为-0.814，表明二者为高相关，二者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翻译任务复杂度与“翻译腔”频率的相关系数为 0.751，说明二者为高相关，二者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翻译任务复述能力与“翻译腔”间的相关系数为-0.602，说明二者为切实相关，二者间存在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3.2 观察结果

笔者及助手对受试正式翻译时的阅读/翻译方式做了统计。具体情况如下：翻译简单句

时 A 组受试均采用了“读后再译”的方式, B 组受试共有 2 人次采用了该方式; 翻译复合句时, A 组受试共有 3 人次采用了“边读边译”的方式, B 组受试 12 人次采用了该方式; 翻译复杂复合句时, A 组受试共有 7 人次采用了“边读边译”的方式, B 组受试均采用了该方式。两组受试的阅读/翻译方式对比情况见图 1。

图 1 受试采用“边读边译”的阅读/翻译方式情况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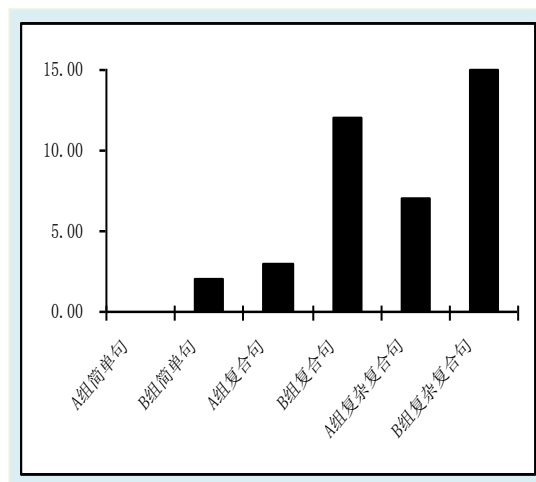


图 1 显示, 随着翻译任务由简单句转向复合句及复杂复合句, 翻译任务复杂度逐步增加, 两组受试采用“边读边译”的阅读/翻译方式的程度均呈现上升趋势。但是, 两组受试使用“边读边译”的阅读/翻译方式的频率及程度差异明显, B 组受试明显超出了 A 组受试。

3.3 受试回忆/再现测试结果

访谈结果显示, 在正式写出译文时, A、B 两组受试在是否能够理解原文方面, 两组受试的表现差异较大。A 组受试均表示能较好地理解原文, 而 B 组受试中有 2 人表示不能透彻理解原文, 3 人则表示说不清楚。

4. 讨论

4.1 翻译任务复杂度、复述能力与“翻译腔”间的相关关系

相关性统计表明, 对于初学翻译的大学生译者而言, “翻译腔”与翻译任务复杂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与翻译任务复述能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翻译任务复杂度越大, 译文罹患“翻译腔”的程度越大, “翻译腔”出现的频率越高; 翻译任务复述能力越强, 译文罹患“翻译腔”的程度越小, “翻译腔”出现的频率越低。

笔者认为, “翻译腔”与翻译任务复杂度和翻译任务复述能力间的相关关系可以在认知心理学和翻译心理学的理论框架下得到说明, 翻译的理解与表达都与译者的认知心理能力, 特别是工作记忆能力关系密切。

4.2 译者的工作记忆

翻译心理学认为, 理解是在记忆系统中进行的。记忆系统大体可以分为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短时记忆现在常被称为工作记忆 (D.W.Caroll, 2004: 47)。工作记忆具备两种功能: 存储和加工。其中的存储功能相当于短时记忆的功能, 而加工功能和加工容量的概念有关 (桂诗春, 2000: 105)。加工能量即我们用于某一任务的所有认知资源, 它被假设为有限的。当任务是新的或者很难的时候, 则需要更多的加工能量, 从而给存储功能留下了较少的空间 (D.W.Caroll, 2004: 47)。工作记忆除了暂时存储信息的短时工作记忆外, 还存在另外一种机制, 即长时工作记忆。理解过程就是在短时工作记忆和长时工作记忆的支持下完成的。为了保持阅读理解过程形成的心理表征在各个水平上的连贯性, 读者必须在短时工作记忆中形

成一个提取结构,将阅读形成的每个命题与长时工作记忆汇总相关知识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知识存储的地址保存下来。命题则以命题网络的形式存储到长时工作记忆中。工作记忆容量或能力与认知加工能力有关。当使用有限的认知资源进行某种认知操作时,加工能力强的人就会表现出较高的工作记忆容量,而加工能力弱的人其工作记忆容量也较低。这种个体的差异实际上反映的是某种认知能力的差异。一旦具备了长时工作记忆,认知资源就被相应地扩充了(崔耀,1997)。

由此,我们可以假定,译者的工作记忆容量与其认知能力有关,A组受试能够较容易地将阅读形成的关于测试句的命题以命题网络的形式存储到长时工作记忆中,因此他们可以较容易地完成翻译复述任务,说明A组受试工作记忆容量相对较大;相反,B组受试很难将形成的命题存储到长时工作记忆中,他们在执行复述任务时遇到了较大的困难,如不考虑语言水平差异因素的影响,可以说他们工作记忆容量小。这一点在两组受试正式翻译时采用的阅读/翻译方式上得到了同样的体现。B组受试工作记忆容量较小,随着翻译任务复杂度的增加,客观地需要加工能量的增加,从而给工作记忆的存储功能留下了较少的空间(Timothy B. Jay, 2003: 165)。因此,他们不得不更多地采用边读边译的方式,来不断刷新其短时工作记忆,以弥补工作记忆容量小的不足。A组受试工作记忆容量较大,即使翻译任务复杂度不断增大,加工能量需求不断增加,多数情况下他们仍能将测试句的命题以命题网络的形式较好地存储到长时工作记忆中,为工作记忆的存储留下了较为充足的空间,因此正式翻译时,他们一般不采用边读边译的方式来不断刷新其短时工作记忆,而更多地采用读后再译的阅读/翻译方式。

4.3 翻译理解与语义表征

图1显示,随着翻译任务由简单句转向复合句及复杂复合句,翻译任务复杂度逐步增加,B组受试采用“边读边译”的阅读/翻译方式的频率及程度明显超出了A组受试。同时,访谈结果显示,在正式写出译文时,在是否能够理解原文方面A、B两组受试的表现差异较大。A组受试均表示能较好地理解原文,而B组受试中有2人不能透彻理解原文,3人则说不清楚。我们认为两组受试在以上两方面表现出的差异与他们对原文的理解结果有密切联系。

4.3.1 翻译理解的特点

认知心理语言学认为,语言理解就是从所接触的语言材料中构建意义的心理过程。言理解过程经历着“顺序相对固定的一系列加工阶段。……从语音加工开始,然后到词汇,再到句法和语义的加工,信息流动朝着一个方向,从较低的水平或阶段进入较高的水平或阶段,相继地得到加工。”(刘绍龙,2007: 225)。但是“各种水平的加工以复杂的方式发生相互作用,信息并不总是朝着一个方向流动,而且一些加工水平也是可以重叠的。”(王甦、汪安圣,1992: 348)。也就是说,译者的源语加工的线性流动特征并不是绝对固定不变的,例如当译者遇到理解难题且无论这些难题发生在哪个阶段或环节时,“倒流”、“回路”的现象是有可能发生的。具体说来,当信息加工至句法阶段,译者有可能重新返回“字词识别”,或者说重新审视曾经加工过的字词信息,以便确认句意或排除歧义结构。这就是说字词识别和句法分析可能呈现“往返重叠”加工,尽管两者的初始加工可能呈现单一的向前推进的特征。理想的翻译理解起于源语视/听觉信号的接收终止于语义表征的生成。

4.3.2 语义表征的建立

关于语义表征,学界至今没有明确定义,普遍认为它是一个抽象、普遍的概念和命题集合(刘绍龙,2007: 271)。命题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某些关系。语义表征以超语言的形式存在着,随时准备着与某一具体语言的编码结合,获得词汇、句法和韵律三个方面的编码加工,最后完成自己的赋形过程。对于翻译来说,语义表征既是译者理解源语的结果,又是译入语生成的源头。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加工原文信息时,随着翻译任务复杂度的增加,译者源语理解加工的常规过程或一般阶段会不断被打乱,经常出现信息加工的“倒流”、“回路”

现象, 具体表现为“边读边译”阅读/翻译。同时, 随着翻译任务复杂度的增加, 受试生成语义表征的难度随之增加。B组受试要么表示不能透彻理解原文, 要么表示说不清楚自己是否理解了原文, 原因就在于此。在这种状态下建立起来的概念和命题集合不能完全脱离原文语言形式, 亦即尚未生成理想的语义表征。正如美国翻译家 Margaret Sayers Peden 说的那样, 原作是一块方方正正的冰, 翻译的过程就是把冰块完全融化后重新结冰的过程 (Roger T. Bell, 2001: 57), 那么受试理解的结果就类似于掺杂着许多小冰块的冰水混合物。当这样的“语义表征”与目的语的编码结合时, 不可避免地会将这些小冰块——原文语言形式的“零部件”会移植到目的语中去, 译文于是会存留原文的某些“形式”特征, 其中的某些特征便是“翻译腔”的促成因素。

5. 结论

由上述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1) 对于初学翻译的英语专业大学生译者而言, “翻译腔”与翻译任务复杂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与翻译任务复述能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翻译任务复杂度越大, 受试的翻译任务复述能力越差, 译文罹患“翻译腔”的程度越大, “翻译腔”出现的频率越高。2) “翻译腔”与翻译任务复杂度和翻译任务复述能力间的相关关系有着深厚的认知心理动因。“翻译腔”的产生或许与译者的工作记忆力有关。随着翻译任务复杂度的增加, 译者用于信息加工的加工能量, 从而使得工作记忆能力的存储容量变小, 译者不得不愈来愈多地采用“边读边译”的阅读/翻译方式来不断刷新其短时工作记忆, 以弥补工作记忆容量小之不足。3) “翻译腔”的产生或许与译者的理解结果有关。理想的翻译理解始于源语视/听觉信号的接收终止于语义表征的生成。翻译任务复杂度增加, 生成认知的, 非语言的, 具有图示性质的语义表征的难度也随之增加, 译者在建立概念和命题集合时就愈来愈难完全脱离原文语言形式, 编码时存留某些源文形式在所难免, 可能促成了“翻译腔”的产生。

总之, 本研究初步表明, 翻译任务复杂度与“翻译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与翻译任务复述能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翻译腔”的产生与译者的工作记忆能力有关, 与其理解不能生成认知的、非语言的, 具有图示性质的语义表征有关。

本研究的局限在于, 受试样本偏小, 且来自于同一所高校。在今后的进一步研究中应注意扩大受试样本量及代表性。

参考文献

- [1] 崔耀. 阅读理解中的长时工作记忆[J]. 心理学动态, 1997(1): 1-5
- [2] 范仲英. 实用翻译教程[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 [3] 方梦之. 译学辞典[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 [4] 桂诗春. 新编心理语言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5] 李荣宝、彭聃龄. 双语者的语义表征[J]. 现代外语, 1999(3): 255-272
- [6] 刘宓庆. 当代翻译理论[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 [7] 刘绍龙. 翻译心理学[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 [8] 彭聃龄. 语言心理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9] 孙致礼. 新编英汉翻译教程[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 [10] 王甦、汪安圣. 认知心理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 [11] Duff, Allan. *The Third Language: Recurrent Problems of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M].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1.
- [12] Carroll, D.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M].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3] Nida E. A. & Charles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M]. Leiden: Brill, 1969.
- [14] Frederick Tsai, *Europeanized Structure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in Sin-Wai Chan & David E. Pollard (eds)[C].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42
- [15] Shuttleworth, Mark & Cowie, Moir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16] Solso, Robert L., MacLin, M. Kimberly & MacLin, Otto H., *Cognitive Psychology* [M].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7] Robinson, P. *Task complexity, cognitive resources and syllabus design: a triadic framework for examining task influences on SLA* [A]. In Peter Robinson (eds.) *Cogn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Instruction* [C].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7: 296
- [18] Bell, Roger T.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19] Jay, Timothy B. *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 [M].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ese” and the Complexity of Translation Tasks &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WANG Fu-xiang , XU Qing-l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reports 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ese”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s by junior English majors and the complexity of translation tasks as well as translators’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equency of “translationese” is in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complexity of translation tasks but in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ranslators’ retelling ability; and presumably “translationese” is somewhat determined by translators’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and whether translators’ comprehension efforts can generate appropriate semantic representations, which are suggested to be of non-linguistic and schematic nature.

Key words: “translationese”, complexity of translation task, working memory, comprehension, correlation

收稿日期: 2009-11-09; 本刊修改稿: 2009-12-21

作者简介: 王福祥, 硕士, 曲阜师范大学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Email: wfxroger@163.com。徐庆利, 硕士, 曲阜师范大学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二语习得; Email: wangxuyang1123@163.com